

海外华文文学

赵遐秋 马相武 主编

综
论

山西教育出版社

海外华文文学综论

赵遐秋 马相武 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晋〕新登字 3 号

社 长 任兆文
总 编 辑 左执中
责任编辑 刘立平
封面设计 马正华
版式设计 荷 屏

海外华文文学综论

主编 赵遐秋 马相武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74千字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

ISBN 7-5440-0835-5

G·836 定价:8.00元

· 代 序 ·

两个名称，一大分歧

——为“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一辩

赵遐秋

80年代初，老作家萧乾、冯牧出访归来，介绍境外的华文文学情景，用了“海外华文文学”这个名称。1982年到1993年，有关方面先后举办了六届大型的学术会议，研讨这种境外的华文文学用名，在广州、厦门、深圳的前三届会议上，则始而为“海外华文文学”，继而演变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复旦大学举办的第四届上海会议，改称“台港澳暨国际华文文学”。随后，第五届中山会议恢复为“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到第六届庐山会议，“则径以超前思想型的‘世界华文文学’旗号，取而代之”^①。庐山会议之后，1994年，全国文联主管、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主办的《四海——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杂志，在当年第1期上的《热门话题》栏目里组织在京五位专家笔谈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与定义。其中，除一位专家主张采用“泛华文学”一名以为未来的“世界性华语文学定位”，另四位专家都赞成采用“世界华文文学”一名。与此同时，《四海》开辟了《〈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入选作家作品选》，文联出

① 见《四海》1994年第1期。

版公司开始出版《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随后，有关的学术团体申请改名，冠以“世界华文文学”，并着手筹备有关“世界华文文学”的大会。

为什么要这样改换一种文学的名称？上述专家笔谈里有一种说法是：“当我们标举‘世界华文文学’而寻求共识时，便有一条神秘的系带将成千上万的作家在黄皮肤的旗帜下联结起来。……这种文学的魔力，确信定能架通此一世界与彼一世界之间的鸿沟，并通过不屈不挠的努力，步入先人们曾经向往的‘饮之太和’的佳境。”

这，无疑是一种真诚而又美好、善良的愿望。

然而，这种愿望会不会只是一厢情愿呢？

且看事情的原委。

1985年春天，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系，来访的联邦德国汉学家马汉茂，和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旅美华人作家、学者刘绍铭，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举办一个国际性的现代中国文学会议”。他们确定，这是一个“把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相提并论的国际性会议”，而且，“把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华文作家与学者一并列入节目表内容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一个流派（不是支流）来讨论”^①。

1986年6月，刘绍铭、马汉茂发起的名为“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的会议，在德国南部的君斯堡（Guenzburg）召开。会后，刘绍铭和马汉茂策划、编辑的《世界中文小说选》上下册，于1987年由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出版。1988年8月15—19日，在新加坡歌

^① 刘绍铭：《世界中文小说选》。

德学院召开了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会后，新加坡歌德学院和新加坡作协把会上发表的29篇论文辑集，题名为《东南亚华文文学》，于1989年出版。1991年9月21—22日，台湾《文讯》杂志社负责人李瑞腾在台北淡江大学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1位作家、学者参加。

经过六年的酝酿、准备，1992年11月23—25日，在台北圆山饭店，“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一届大会”正式召开。来自欧美、澳洲、东南亚和韩国等地的150名华文作家参加了大会。李登辉和台湾“文建会”主委郭为藩相继在会上讲话。“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就这样开始流行起来。

对于“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的出现，台湾《文讯》杂志1993年5月号发表陈慧桦《世界华文文学：实体还是迷思》一文，明确认定“跟经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据说，这关系就是：“马列意识形态的松动、崩溃自然有助于西方人降低对华人的敌视，而且更有助松弛消弭华人地区中同质性与异质性文化政治的敌对状态。……台湾商人在东南亚各地的投资更促使本地区土著对华人有了较为积极肯定的看法。”

对于“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陈文则有如下的理论界定：“‘世界华文文学’此一概念将跟新华文学、马华文学、菲华文学、泰华文学，甚至亚华文学、欧华文学、美华文学等辩证地出现，或虚或实，吾人自可依不同的视域与标准来组构、解构之，这自是文学政治（指圈外者）的一种。”“各地区的华文文学与母体的台湾文学、中国文学应该是大中心与小中心的辩证、互动关系，而不应是中心与边陲、主流与支流这种含有霸权的、主宰的关系。”

“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的首创者和积极提倡者、努力推广使用者说，他们追求的理想是：“怀恢宏之量，采相对标准。”^①对

① 刘绍铭：《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前揭书》。

此，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在新加坡会议上发表的《总结辞》有一个明确的注解是：“我们如有‘多元文学中心’的概念，各地区华文文学也许会发展得更富活力，更多彩多姿。”

简单地回顾十多年来“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提出并推行的情景，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

第一，此举的始作俑者和热心人士，都有着某种台湾文学界的背景；

第二，他们自认，这一名称的出现，“跟经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

第三，他们宣称，“这自是文学政治的一种”；

第四，他们坚持“把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相提并论”，主张“台湾文学、中国文学”同是“各地区的华文文学”的“母体”。

第五，他们追求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学中心”，同时反对中国文学对于境外华文文学的“中心与边陲、主流与支流这种含有霸权的、主宰的关系”。

二

既然“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的提出，有着某种台湾文学界的背景，我们就不能不密切地注视台湾文学界的一种令人瞩目的动向。

台湾岛上的新文学，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战时体制下的限制和压力，使台湾新文学严重滑落。不过，直到1945年日据时期结束，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与成长依然是可观的。其后，台湾新文学虽经“二·二八”摧残，还是得到了重建。1949年，国民党政府去台，在思想上独尊三民主义，并以三民主义文艺论指导文学艺术创作，加之政治上实行“戡乱”、“戒严”，“三民主义文学”、“反共文学”风行一时。

1956年9月，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夏济安，因对反共八股文艺不满，创办了《文学杂志》。《文学杂志》为台湾现代派的崛起做了舆论准备，培养了人材，是台湾现代文艺思潮的前奏。1960年3月，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问世，现代派文学开始盛行起来。这个文学流派打破了50年代反共八股文学控制文坛的局面，引进了西方文学技巧，确实提高了台湾文学的艺术素质。但是，部分现代派的作品空洞晦涩，脱离实际，又陷入了形式主义的刻意模仿。于是，1977年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这场“乡土文学论战”，既针对僵化了的“反共文学”，又指向了主张西化的现代派文学，其含义和内容都有了新的发展。只是，论战中，人们对台湾乡土文学的阐释有所不同。叶石涛强调的是台湾乡土文学的本土性、地方性。他认为，“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应该是台湾人（原住台湾的汉民族及原住种族）所写的文学”，它“应该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整个世界”^①。陈映真则认为：“台湾的新文学，受影响于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有密切关联的白话文学运动，并且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有着绵密的关系；也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的一环”；“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②。

1980年开始，在蒋经国的主持下，台湾政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县市政权，连台湾当局的“中央政权”也逐渐本土化，从“二元政治”发展为“一元政治”。随后李登辉上台，怂恿“台独”势力发展。与这种情势相适应的是，在台湾文学界中一种新的动向出现了。有人有意强调“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与“台独”的分离主义相呼应。这种动向，到90年代更为突出了。

① 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

② 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

在前述的1991年淡江大学会议和1992年圆山饭店会议之前,1990年6月,为“推动台湾文学的学术研究”,《台湾文学观察杂志》创刊。1991年3月,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出版了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一书,就创作情况作了总结,与《台湾文学观察杂志》作了呼应。

1993年4月到6月,三个月内,由台湾“行政院文建会及新闻局”赞助,《文讯》杂志社连续举办了六场“台湾地区区域文学会议”。这六场会议,依序是:花莲、台东地区(4月10日),高雄、屏东、澎湖地区(5月1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5月8日),台中、彰化、南投地区(5月22日),桃源、新竹、苗栗地区(6月6日),台北、基隆、宜兰地区(6月26日)。会议的中心是台湾六个小地区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其实质是张扬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文讯》社长许福明说得很明白:“此六场会议目的,是在藉由各地小的文学传统中,探求属于台湾地区整体的文学形貌。”^①

这中间,关于“台湾文学”,他们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主张呢?

《台湾文学观察杂志》创刊号上,尹章义的《什么是台湾文学?台湾文学往哪里去?》一文说:“更激烈的‘台湾派’,不仅要建立特殊化的‘台湾文学’,更要建立和中国文学分立并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文学’。”尹文还指出:“为了产生‘独立自主的台湾文学’,最近的趋势是发展‘以台湾话文写作的文学’。”他个人则认为:“台湾作家写作的客体已经呈现了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只有量多质精的‘台湾文学’作品,才能使‘台湾’文学成为中国或华文文学的主流。”

该刊第2期,向阳著文《可被撕扯可被摇撼,不可自我迷走!》宣称:“‘台湾文学’终于成了在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人的文学之最

^① 见《文讯》1993年第8期。

适切妥当的指称；尽管仍有部分作家坚持其作品为‘在台湾的中国文学’，或自称其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而官方也仍力倡所谓‘三民主义文学’，但都已无损于台湾文学的自主性，也已撼动不了台湾文学这样历经了七十年风雨撕扯、摇撼的大树。”向阳还承认，这种文学运动的开展，“与台湾最大反对党民进党从政治上争取台湾人主权的理念若合符节”。

该刊第4期，游胜冠发表《〈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结论》一文说：“关于台湾文学本土论与中国文学论的争执，当然不只是名辞之争而已。”游文介绍说，以叶石涛的“本土论”和80年代末宋泽莱为代表的“一元论”认为，“台湾本就是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民族、文化，当然‘台湾文学’也应该是从不属于‘中国文学’，一直是在台湾独立完成的文学传统”。

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一书，最后把分歧概括为“台湾结与中国结”的纠葛，对“中国结”的代表人物陈映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彭瑞金主张：“台湾文学应以本土化为首要课题。”

说到六场会议，《文讯》1993年第8期上的有关会议的《专辑》也指出，“旨在从根本处去看文学与土地、人民之关系，更希望横向联结不同区域以整合成整体的文学台湾”。花东地区文学会议上的一篇文章还认为：“讨论地方文学与地方认同，其实是丰富了‘台湾文学’大擘下的差异性。两者之间是互相存在且互为主体。”作者还明确地说：“如台湾独立，台湾文学会被认可。”

就在这六场会议的最后一场，李瑞腾提交了题为《台北：一个文学中心的形成》的论文，提出了“一个真正的文学中心”的问题。论文说：“我们希望‘台北’更可以是海峡两岸现代文学之中心，……更进一步使它成为全世界中（华）文文学之中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理念与企图心，要做其实也不难，就看我们是否有心了。”宣讲时，作者又提出了“瓦解北京中心”的口号。周欣雅侧写

“北基宜”地区文学会议的《多元中心的理想》一文，也写道，论文发表者“事实上是企图在瓦解‘中心’的概念”。

《文讯》1993年5月号上，叶海烟的《本土化与平民化》一文，还曾宣称：“我们都脚踩大地，头顶高天，我们是有能力在台湾的现实之上构建那足以包容‘中国’的殿堂。”

对于上述情景，我也想提请大家注意：

第一，在台湾，80年代开始，原来意义上的“乡土文学”质变为“本土化”的“台湾文学”了；

第二，这种“台湾文学”是“和中国文学分立并具有主体性的”、“独立自主”的文学；

第三，这种“台湾文学”是和“台独”的民进党的思想相合的，“如台湾独立，台湾文学会被认可”；

第四，这种“台湾文学”是“中国或华文文学的主流”。

第五，这种“台湾文学”的中心台北，“更可以是海峡两岸现代文学之中心”，要“更进一步使它成为全世界中（华）文文学之中心”，为此，要“瓦解北京中心”。

三

在岛外，倡言“世界华文文学”；在岛内，声称瓦解“北京中心”；同时标举“台湾文学”要成为这种“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这就是一些台湾文学界人士的抉择。

怎么看待他们的抉择？

首先，不管是把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相提并论”，还是把台湾文学看作是“和中国文学分立并具有主体性的”、“独立自主”的文学，他们都违背了历史事实，篡改了或者曲解了台湾文学发展的历史。

事实上，台湾文学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在台湾独立完成的文

学传统”。

谁都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早在 2000 多年前，海峡两岸人民之间就建立了联系。秦汉以来，这种交往就频见于史传了。甲午战后，清朝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侵略者侵占台湾以后，台湾人民在铁蹄蹂躏之下过着亡国的悲惨生活。然而，此后的五十年，爱国的台湾各族人民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反抗斗争，为争取解放祖国的神圣领土，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其中，文学作为一条重要战线，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台湾岛上的新文学运动，发端于 1920 年 7 月《台湾青年》创刊。创刊号上，陈炳发表《文学与职务》一文。陈炳说，真正的文学应该负有传播文明思想，改造社会之使命，近来在中国大陆所提倡的白话文学便是这种文学。陈炳呼吁，有光彩的历史的台湾文坛，也应朝此一方向去努力。随后，《台湾青年》第 3 卷第 3 期，发表甘文芳的文章，向台湾同胞介绍了新文学运动。同一卷的第 6 期，陈端明发表《日用文鼓吹论》，更明确地指出：“今之中国，豁然觉醒，人用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台之文人、墨士，岂可袖手旁观，使万众有意难申乎？切望奋勇提倡，改革文字，以除此弊，俾可启民智，岂不妙乎？”从这几篇文章可以看出，这是一份《新青年》式的刊物。它表现了台湾文学界紧紧追随在祖国大陆的文学革命运动之后，要兴起一个新文学的运动了。随后，由《台湾青年》改名的《台湾》，增办的《台湾民报》，也从提倡白话文着手，催促台湾新文学诞生。《台湾民报》还大量介绍祖国大陆的新文学作品。1924 年，还在北京读书的台湾青年张我军，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台湾民报》上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向台湾的旧思想、旧文化、旧文学发动了进攻，一场新旧文学的论战在台湾爆发，新文学也就在这场论争中正式诞生。

这说明，台湾文学，一开始就是和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联系在一起。

其后，虽经日据时期、国民党去台统治时期的发展，台湾文学也始终没有“分立”出去，始终没有“独立自主”，始终不是独立完成的文学传统。

第二，台湾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乡土”情结、本土性，只在发展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地域风格的审美特征上是有意义的。他们把“乡土”、本土性蜕变为“本土化”，蜕变为分离主义的“独立自主”化，是错误的。

台湾文学和祖国大陆上母体的本根的文学，没有“分立”，是因为这种文学“质”的规定性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这种中国新文学的“质”的规定性，除了作品的现代的思想意识、民族的社会生活题材、民族的人物形象等等因素，就其载体而言，最重要的还是：以现代白话文的汉语言文学为第一载体；以现代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等文本为第二载体。七十多年来，台湾文学的第一载体、第二载体是绝对没有发生质的改变的。这十多年，一些人提倡“以台湾语文写作的文学”，充其量，那也只是一种方言文学作品，何况，虽经极力鼓噪，也没有成为气候。

第三，把台湾文学看作是“中国或华文文学的主流”，抑或是“母体”，他们也违背历史事实，篡改、曲解了中国和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

事实上，海外华文文学最初也是祖国大陆上的新文学的一个分支和组成部分。它是20年代最先在新马等南洋一带兴起的。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里，马华、新华新文学已经蔚为大观。迁延而及，泰华、菲华、印尼华等新文学，也方兴未艾，日见其声势之可观。本世纪40年代末期以后，又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知识分子定居海外，特别是定居于欧美各国，于是，又有一批华文文学作家

出现。发展到最近二三十年，在西方，以美华文学为主，名家辈出，佳作纷呈，竟在世界文坛独树一帜，影响日渐深远。现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家遍布世界许多国家，海外华文文学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了。然而，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毕竟都是“五四”时期以来的新文学在台港澳地区和海外一些国家的延伸和发展。台湾文学何以能成为“主流”？怎么又是“主体”了？

当然，这种“延伸”和“发展”，即使呈现为“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的状态，这也只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也决不含有所谓的“霸权”与“主宰”的关系。

四

回到我要论说的话题上来，我想，在采用“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新名称取代“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的原有名称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十分严峻的事实是：

在台湾，有一种势力，在文学领域里，与政治上的“台独”或“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相呼应，在符合台独理念的大前提下，鼓吹发展分离主义的台湾文学。这种台湾文学，他们看作是“文学政治”的一种，声明，“如台湾独立”，则会被认可。可见，这种台湾文学实质上是“台独”的文学。

为与祖国大陆的文学分庭抗礼，他们在海外鼓吹多元化的、“大同世界”式的“世界华文文学”，以抹煞祖国大陆文学在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主流的、中心的、本根的、母体的地位，并取而代之。

还不等到这种台湾文学发展成一定的气候，从制造舆论到实际操作，他们已经急不可待地要跟“在台湾的现实之上构建那足以包容‘中国’的殿堂”的叫嚣相呼应，在文学上，“瓦解北京中心”，使“台湾文学”成为海峡两岸现代文学之中心，以至“全世

界中“(华)文文学之中心”了。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看到这两个有关华文文学的名称，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原则性的、根本意义上的分歧——我们和台湾文学界一些人之间的“统一”和“分离”的分歧。

也许，我们的一些好心人，生于礼仪之邦，长于礼仪之邦，不愿意我们的文学被别人指责为“主流”、“中心”、“本根”、“母体”乃至“霸权”、“主宰”，然而，殊不知，就在我们存有这些多余的担心时，有人已经要“瓦解”我们，“包容”我们，做我们的“中心”，对我们显示“霸权”，并试图“主宰”我们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标举“世界华文文学”，难道不该深思，不该慎之又慎么？

• 目 录

上 篇

- 一 源远流长,走向辉煌
——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历史及其嬗变 (3)
- 二 变与不变之间
——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源流关系 (21)
- 三 两大文化板块的碰撞与交融
——海外华文文学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36)
- 四 心灵痛苦的艺术升华
——海外华文文学的放逐主题 (50)
- 五 走向转折的历史必然
——海外华文文学的回归主题 (71)
- 六 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
——海外华文文学的艺术探索 (93)

下 篇

- 一 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深入
——欧阳子的小说世界 (107)

二	华人文化观念的文学投影	
	——於梨华小说的价值结构	(122)
三	万水千山寄远思	
	——聂华苓创作论	(136)
四	“新加坡屋顶下”的审美观照	
	——陈瑞献创作论	(158)
五	真诚而自由的心灵梦幻	
	——梦莉创作论	(171)
六	“浪漫写实”的叙事转换	
	——赵淑侠创作论	(186)
后	记	(210)